



汉朝的 “大一统”

学术引领

“大一统”始见于春秋时期的《公羊传》，其基本含义是：以天下之统一为大。汉武帝开创的“大一统”格局，上承秦朝，下启隋唐，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大一统”的主要内涵

“大一统”的理念在先秦已经出现。何星亮在《“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载《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大一统”理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天下一统，即国家领土的完整。在中国古代，“天下”一词为地理概念，指古代中国的领土。随着知识的积累与扩充，其所指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第二，政治一统，即天下统一于一个国家、一个君王。政治版图的统一是“大一统”理想状态的先决条件，而“天下大治”则是大一统的最终目标。第三，思想一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种价值作为共同的核心价值，法令、制度就不能保持一贯性；法令和制度如果经

常变动，人民就无所适从，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有了统一的思想，才能保证法制号令、规章制度的畅通无阻，人民的行为才有明确的规范，就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国家才有可能长治久安。第四，民族一统。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华夷一体”的观念。区分华夏与“四夷”的主要标准是文化，即“周礼”，实行周礼的族群被称为华夏，不遵守周礼的族群被称为“蛮夷戎狄”。无论是华夏还是周边少数民族，人人都可以接受周礼，都可以成为“中国之人”。因此，华夏族应当通过加强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促进周边民族文明水平的提高，实现民族间的融合。古代中国并没有狭义的民族观，没有明确的民族边界，秦汉、隋唐王朝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华夏族与周边民族融为一体。

徐黎丽、李姝睿在《“大一统”天下观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影响》（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大一统”是对国家统一的推崇。“大一统”的天下观不仅包含一统的思想，而且也包含一统的地理范围，以及为达成一统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薛海玲、奚纪荣在《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理念的形成及统一战争的实践》（载《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大一统”理念包括思想方面的“大一统”和政体方面的“大一统”两部分。思想方面“大一统”的突出表现是，以儒家的“忠君尊王”为基础。儒家的传统观念认为，帝王是上天之子，其一切言行均体现天意。人不能违背天意，因此，必须“忠君尊王”，只有“忠君尊王”方能保持天下一统。政体方面的“大一统”，分为王权政治下的“大一统”和皇权政治下的“大一统”两种形态。前者以宗法分封制为主要内容，与之相对应的是，维护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以及地方分立割据的政治格局；后者以郡县制为主要内容，与之相对应的是，承认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和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国家的统一和思想文化的统一。

徐平华在《汉武帝“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大一统”是汉武帝国家观的核心，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主权统一方面，汉武帝主张“尊王攘夷”^①，即对内强调中央权威，对外反对少数民族入侵，其实质就是维护主权统一。闽越攻打南越时，汉武帝出兵

^① “尊王攘夷”一词源自春秋时期，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本意为“尊勤君王，攘斥外夷”。“尊王攘夷”的王指周王。

相救，充分体现了其维护中央权威的决心；对匈奴的反击战，名为“攘夷”，反对少数民族的侵扰，而实质是对外维护主权统一。第二，在民族统一方面，汉武帝主张“华夷一统”，实现民族统一。当匈奴浑邪王率部来归时，汉武帝不仅封其为侯，还分置五个属国，并特许“因其故俗”，这充分体现了汉武帝实现民族统一与和谐的决心。第三，在疆域统一方面，汉武帝的不懈努力充分表现出了其维护疆域统一的坚强决心。他北击匈奴，东击朝鲜，西定西域，南定百越，从而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①。

二、汉“大一统”的时代背景

孙家洲、王文涛在《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汉武帝执政之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不完备、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而国家制度的不完备，则已构成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对此，应时而出的董仲舒提出必须变革国家制度，才能真正达到天下大治；当时的思想家刘安，也大谈法令制度必须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汉武帝厉行改制既是其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其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

李大龙在《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经过文、景二帝的“无为而治”^②，西汉的国力不断增强，到汉武帝即位之时，经济发展状况已与汉初残破的经济状况不可同日而语。武帝时期强大的国力不仅为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汉武帝实施“大一统”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安作璋、刘德增在《论汉武帝》（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汉武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呼唤巨人并能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父祖为武帝留下了若干亟待解决的历史难题，诸如黄老无为的历史使命虽已结束，却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诸侯王骄横不法，有的甚至觊觎皇位；当朝丞相权势过大，皇权遭到削弱；大漠匈奴不时侵掠，和亲政策难以奏效，等等，这些都迫使武帝必须有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② 张燕婴译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2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所作为。另一方面，父祖也给武帝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诸如经济繁荣所带来的雄厚国力，以及60多年休养生息、无为而治赢得的民心，等等，从而使武帝有条件大有作为。

卢国强在《从〈天人三策〉看汉武帝独尊儒术》（载《衡水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汉武帝即位时的政治形势为《天人三策》赢得武帝的青睐提供了契机。武帝即位伊始便面临内政上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外交上必须反击匈奴侵扰这两大历史重任。而此时西汉国力的雄厚，武帝好大喜功的特性，都决定了武帝一定会奋然跃起，内多兴作，外勤用兵，一展其雄才大略。事功的建立需要舆论先导，而此时，汉初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指导思想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绌抑黄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便成为时代的必然。

王建中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背景剖析》（载《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与当时复杂的文化背景及特定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汉初统治者将秦亡之鉴主要归为以法治国。由此，法家思想在汉初被等同为暴虐无道、穷兵黩武，曾遭到一片反对。因此，嗜欲多为之武帝若要施行“法治”就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熨帖的理论对之加以掩饰。第二，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在创造“文景之治”的同时，也使西汉政权陷入一系列的危机之中。例如，“七国之乱”这场由西汉诸侯王国掀起的叛乱，就是“无为而治”思想在政治领域失败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因此，为确保刘汉江山稳固，汉武帝必须重构一个意识形态的霸权。第三，武帝时期的儒家思想通过对各家学说的兼收并蓄，变得更加博大精深。董仲舒的新儒学便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手段，兼采道家合理内核建构而成。同时，儒家思想学科精细，名家辈出，很容易统摄当时社会的思想，因此在国家步入正轨之后，儒学最适宜作为主导文化。不仅如此，儒家思想还具备适于执政集团统治的众多“长处”，可作为汉武帝用于掩饰“法治”的最好外衣。例如，儒家思想注重宗法伦常，强调等级秩序，有利于统治者通过要求广大劳动群众绝对服从专制主义统治，获得最高的政治权威。又如，以儒生为主体的士人阶层宣扬的一系列旨在确立君主在人世间至高无上地位的理论，有利于统治者树立绝对的政治权威。

张颐在《儒学与政权之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再思考》（载《研究生法学》，2012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一种思想的崛起绝不是仅仅依靠思想

本身的力量，而是在于特定时代的政治需要。因此，对汉武帝时期政治背景的分析，是解释汉武帝“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产生的关键。汉武帝时期，为克服汉初郡国制带来的危机，已经积聚了足够力量的皇权开始了新一轮的对中央集权体制即政治大一统的强化，因而亟须适当的理论佐证。而此时的儒家思想，旗帜鲜明地推崇“大一统”，主张维护集权秩序、强干弱枝，不仅为汉武帝提供了一个能够论证、巩固、强化政治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系统，而且能够对广袤帝国的多元思想进行整合，因此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舞台。

三、汉“大一统”的理论依据

1. 《春秋公羊传》

寇养厚在《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载《文史哲》，199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公羊传》这部解释《春秋》经义的“传”体著作，之所以备受汉武帝重视，既有其总体原因，也有其具体原因。总体原因在于：《公羊传》属于政治理论性著作，易于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理论依据。《春秋》开篇的首条经文仅“元年，春，王正月”^①六个字，且只记时间，未记任何事件。而《公羊传》却通过长篇议论得出结论，称这一记载体现了《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具体原因在于：第一，《公羊传》能为汉武帝统一全国政治、实行中央集权制提供理论依据。《公羊传》极力倡导“大一统”这一“以天下之统一为大”的理论。《公羊传》不仅在开篇明确提出《春秋》具有“大一统”思想，还在全书结尾处指出，《春秋》一书旨在拨乱反正，复归天下统一之治世，可见该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大一统”思想。第二，《公羊传》能为汉武帝统一全国思想、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理论依据。据《汉书》记载，董仲舒在其贤良对策中大力倡导《春秋》“大一统”思想，将儒家之外的各家学说统统斥为异端邪说，认为只有禁绝各家异端邪说，才能使意识形态趋于统一。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各家学说，独尊孔子之术的思想正是源于《公羊传》中提出的“大一统”思想。

2.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王立群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大帝》(76~81页，郑州：大象出版社，

^① 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全二册），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2012)一书中指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所以能够吸引汉武帝,关键在于这三篇策文解决了汉武帝最关心的五个问题。第一,“新王改制”说解决了汉王朝合法性的问题。所谓“新王改制”指新建王朝的皇帝即位之后要改变一整套仪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前朝的历法和前朝崇尚的颜色。之所以要在这些形式上大做文章,不仅是为了告知天下百姓,政权已经更替,更是为了借此说明君权乃天授,非人力所为,只有天命所授之人,才能推翻前朝,建立新朝。第二,“大一统”说有利于汉武帝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汉武帝一生致力于中央集权,并且凭借高度的中央集权最终完成了北击匈奴、统一中国的大业。因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宣扬的这一高度重视天下统一的“大一统”思想,对于此时正在着手完善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汉武帝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第三,“立太学,举贤良”说有利于汉武帝培养和选拔人才。治理天下,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鉴于此,针对人才培养,董仲舒提出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乡学;针对人才选拔,董仲舒建议将汉文帝时期开创的“举贤”做法制度化,形成察举征辟制,从而为汉代人才选拔提供了制度保障。第四,“尊儒术,正思想”说有利于汉武帝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有利于管理,因此历来深受统治者重视。“尊儒术”所尊崇的是吸收道家、阴阳五行家、法家等观点改造而成的更适合汉代社会需要的新儒学。而通过“尊儒术”统一思想,比之于秦始皇焚书的行为,不仅显得尤为温情,而且更具操作性,因而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第五,“主变革,求发展”说对汉武帝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汉武帝即位以来最关切的就是变革图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为什么要变革,还从具体实践的角度指出了该从哪里变革,从而极大地迎合了汉武帝的心意。

张颐在《儒学与政权之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再思考》(载《研究生法学》,2012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一种思想学说要成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取得在其他学说之上的独尊地位,就要建立一个包括“天然合理的终极依据、涵盖一切的理论框架、解释现象的知识系统以及切合当时可供操作的政治策略在内的庞大体系”^①。董仲舒建立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体系,以传统儒学为基础,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25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兼容阴阳五行、道、法等社会思潮，具备了上述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条件。这一理论体系从天命观的角度论证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宇宙观的基石。将君臣关系中的尊卑有序视为天然的大义，迎合了汉武帝强干弱枝的政治需要和心理需求，从而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做好了理论准备。

卢国强在《从“天人三策”看汉武帝独尊儒术》(载《衡水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汉武帝即位以来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给出了理论上的指导，因而深得武帝之心。第一，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具有绝对权威，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该绝对服从君主，这为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第二，一个有为之君，应该勤勉努力，绝不能无所事事，要把握时代脉搏，随时而动。“大一统”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应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这为汉武帝扫匈奴、建事功作了舆论上的先导。

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夸大董仲舒对汉武帝“大一统”思想形成所起的作用。李大龙在《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汉武帝即位之后遇到的第一个边疆民族问题便是百越问题。西汉初年，中央通过册封确立了闽越、东瓯、南越这三个百越政权的臣属关系，然而这三个政权之间却经常发生战争。因此，如何维持这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西汉王朝间的臣属关系，便成为摆在汉武帝面前的紧要问题。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闽越出兵东瓯，东瓯向汉朝告急，汉武帝不顾太尉田蚡劝阻，毅然决然发兵相救；建元六年(公元前135)，闽越又出兵南越，南越上书告急，汉武帝不为淮南王刘安的反对所动，再次毅然决然出兵相救，从而不仅解决了三个百越政权间的冲突问题，也巩固了它们与西汉王朝间的臣属关系。随后，汉武帝派遣心腹之臣严助向反对出兵的淮南王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这是汉武帝第一次阐述其治理边疆民族的主张，即以“汉为天下宗”^①。这一观点的提出，说明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早在其处理百越问题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董仲舒依据《春秋公羊传》对“大一统”的阐释，发

^① (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第三十四上》(第9册)，27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生在汉武帝处理百越问题之后，是对武帝七年发出的“诏贤良”的具体回应，也是对武帝“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理论细化与系统论证，因此其只是为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而已。

四、汉“大一统”的具体措施

1. 政治方面

徐平华在《汉武帝“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为实现政治“大一统”，汉武帝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在处理华夏族地区的问题时，针对汉初以来诸侯尾大不掉的难题，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把土地分封给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子弟，从而使封国逐渐无力对抗中央；而对于阴谋不轨的诸侯王，武帝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坚决诛灭，并除国为郡。在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时，汉武帝采用“因俗而治”的办法，即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使其乐意接受汉之管理与统治，最终保证政治统一。

孙家洲、王文涛在《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为实现“大一统”，汉武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地方与中央的问题上，针对汉初“郡国并行”造成的尾大不掉的弊端，汉武帝颁行“推恩令”，削弱藩国实力，使之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在相权与皇权的问题上，针对汉初丞相位尊权重的弊病，汉武帝增设由皇帝亲信组成的“中朝”，对抗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实现了从制度上对相权的限制甚至侵夺。在官僚队伍的管理上，针对西汉前期任官制度粗疏的弊端，汉武帝设立察举征辟制与太学养士制，增设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完善了对官吏的选拔和监察制度。

2. 思想方面

徐平华在《汉武帝“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为实现“大一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通过设立五经博士，以研习儒家经典和礼仪作为升官和补官条件，从而实现了“独尊儒术”，思想统一。但值得一提的是，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堵塞其他各家的晋升之道，例如，张汤、赵禹、江充等是法家代表，主父偃是纵横家代表，东方朔是杂家代表。

3. 经济方面

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50~57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中指出,为实现“大一统”,汉武帝在宏观经济制度层面推行了一场整体配套制度改革,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产业方面,将利益最为丰厚的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等相继国营化。实行币制改革,废除民间铸钱的旧俗,规定由政府统一铸造五铢钱。实行盐铁和酿酒专营,其中盐业和酿酒业采取招募民众生产,官府专卖的办法;冶铁业实行“采产销”均由政府设置的铁官全面管制的办法,从而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第二,在流通方面,实行“均输”“平准”。根据汉律,所有郡国须向朝廷进贡当地的土特产。“均输”就是实行统购统销,即政府通过在各郡设置的均输官,将品质一般、无须送往京师的贡品,统一运至邻近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售卖。“平准”就是实行物价管制,即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控制市场。由此,汉武帝建立起一个国营商业体系,控制了全国重要物资的流通利益。第三,在税收方面,颁布“算缗令”和“告缗令”。“算缗”,即向商人、高利贷者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告缗”,即鼓励民众举报隐匿财产不报或自报不实者,对于告发之人,政府赏给所没收财产的一半。这两项举措最终使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进入国库。

4. 军事方面

白寿彝、高敏、安作璋在《中国通史(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2版,264~27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一书中指出,为实现“大一统”,汉武帝曾长期对边境地区用兵。这些战争有的属于防御少数民族贵族对中原农业地区的袭扰、掠夺,具有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侵犯,造成了破坏。汉朝廷对匈奴的战争,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从此,边郡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连成一体。另外,东南地区居住着越族,其主要分为闽越、东越、南越^①三支。闽越王曾发兵围东越王都东瓯,汉武帝派兵相救。后闽越王进攻南越,武帝再次出兵相助。从此,江淮之间的闽越人、东越人逐渐与汉人融合。

^①“越”亦作“粤”。

五、汉“大一统”的历史意义

李元晖、李大龙在《“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汉武帝“大一统”观念及其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汉“大一统”王朝的疆域成为后代比附与夸耀“德政”的对象。在中国古代,疆域超过前代往往是后代统治者“立国”的标准之一,自《汉书》始的各正史基本上都有对王朝疆域的具体记述,且都将西汉“大一统”王朝的疆域作为阐述疆域时比照的对象。第二,汉“大一统”王朝的郡县区域成为隋唐两朝不得“不臣”的区域。完成统一大业是每个自认为是中国“正统”王朝的统治者的梦想,而统一的范围则以秦汉郡县管辖的范围为基准。隋唐两朝的文帝、炀帝、太宗、高宗四代皇帝,之所以不惜倾全国之力,持续不断地掀起对东北边疆高句丽政权的征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句丽政权所在的辽东之地在汉代即为中央政权管理的一个郡,只有征服高句丽方能实现对西汉郡县区域的“一统”。

李天雪在《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强大的统一政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加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统一,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以及汉帝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推动下,汉朝出现了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特征的“汉朝模式”,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在一个安定平和的环境中保持和发展。

六、汉“大一统”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 汉武帝确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周桂钿在《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兼论思想方法诸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汉武帝确曾独尊儒术。周桂钿指出,对于汉武帝时代思潮特征的概括,应看其主流。汉武帝兼用诸子百家,不仅任用儒家的人才,如公认的汉代大儒董仲舒、公羊春秋的研究者公孙弘等人,也任用尊崇黄老学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学纵横术的主父偃,学杂家的东方朔等其他学派的人

才。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因为他并未将道家、法家的书定为经书，而是只将儒家的书定为经典，并设立五经博士，专门传授儒家经学。自此，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学正式宣告诞生，汉代也因而被称作经学时代。综上所述，在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是时代思潮的主流。

管怀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载《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这一过程具体由以下六个阶段构成：

第一，罢黜刑法，剪枝弱干。汉初统治思想首推黄老，次崇刑名。对此，少年即位的武帝，之所以将罢黜刑名、法家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是由于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特别是“好黄老之术”且大权在握的窦太后，只能借助丞相卫绾批判申不害、商鞅、韩信、苏秦、张仪之言论打迂回战。卫绾批判的核心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刑名之术，而申不害的学说又是源于黄老之学，从中不难看出，此举旨在通过剪除刑法枝蔓以削弱黄老主干。但这一回合的较量终以卫绾被免相，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告终。

第二，设立明堂，公开较量。汉武帝按古制建立宣明政教的明堂，这既是儒学派继续进攻的信号，又是黄老派进一步反击的契机。围绕此事，以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等为主的儒学派与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派，展开了一次最重大的政治较量。此一回合，不仅设立明堂未得善终，且窦婴、田蚡被免职，王臧、赵绾被杀，儒学派可谓损兵折将，黄老派则出尽风头。

第三，增置博士，表彰儒学。建元五年（公元前136），“置五经博士”^①，此举对表彰儒学的意义主要在于：使儒学经典成为官学，使博士一职开始向儒家经学博士演进；规定每位经学博士教授十个弟子，壮大了儒学势力；允许博士弟子终身免除徭役，专心治学，进一步提高了儒学地位；通过博士传弟子，弟子再传，层层教授，推进了儒学思想的统一。

第四，绌抑黄老，政治实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窦太后去世，黄老派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者。武帝立即重新起用窦婴、田蚡，控制了政权。田蚡以外戚和丞相的

^①（东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第1册），1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双重身份，乘势“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①，从而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愿景。

第五，制策贤良，理论完成。政治胜利只能为理论实现开辟道路，代替不了理论本身。儒学要取得实际的统治地位，还须依靠自身的理论建设。元光元年（公元前134），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罢黜各家学说、独尊孔子之术的建议。此举不仅指明了“绌抑黄老”之后的理论发展方向，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活动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从理论上最终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任务。

第六，任用儒吏，组织更新。一种统治思想的贯彻，离不开组织的保证。继董仲舒完成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建设之后，公孙弘又建议武帝实行组织更新。他不仅提出了明确的组织路线，而且还辅以周密详备的实施意见，从而将任用儒吏的做法提升为吏治原则。这一建议得到武帝批准后，儒家一向追求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

2. 汉武帝未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杨生民在《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也谈思想方法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汉武帝并未独尊儒术，因为汉武帝不仅尊儒术，也重法家思想、重法制。这主要表现为：继承先秦法家激进的改革思想推动改革；制定严密的律令，贯彻先秦法家“法不阿贵”的精神；用人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使包括法家学派在内的其他学派的士人得以踏入仕途。而武帝之所以重法家思想、重法制，其原因在于：在长达约40年的对匈战争中，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迅速筹集到充足的军费，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因此武帝只能依靠法家的严刑峻法解决问题。

孙景坛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纯属子虚乌有，其理由有两个方面。第一，与史实不符。历史上一直宣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指的是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开始到建元六年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而董仲舒则是在元光元年的诏贤良对策中方才提出罢黜各家学说、独尊孔子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第10册），31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之术的建议。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建议并非建元六年前尊儒活动的起因，而是其结果。第二，与汉武帝实际行动不符。首先，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汉武帝听取了董仲舒的建议后，在思想领域对“百家”展开了围剿，将儒学绝对化。其次，建元六年的“绌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只能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因为此处的“绌”虽通“黜”，但意为“贬退”，与“罢黜”之“黜”的含义“废弃不用”并不相同。因此，所谓“绌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包含三层意思：一将黄老从正统思想的宝座上拉下来，即“绌”；二不给其他学派跃上这个宝座的机会，即“抑”；三让黄老与其他学派均安居在野地位，即对其仅仅是“绌抑”。由此可见，所谓“绌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只是让儒学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而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微课设计

微课设计一：从汉武帝颁行“推恩令”看汉“大一统”

设计意图

“大一统”是一个宏大而抽象的概念，要想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只能通过具体的人与事。汉武帝是汉“大一统”政策最重要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推恩令”是其强化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的重要举措之一。本微课拟以“推恩令”为视角，引导学生理解与认识汉朝的“大一统”。

设计方案

汉初，高祖刘邦立嫡长子为太子，分封其余刘氏子弟为王，镇抚一方，以为如此便可确保刘氏江山永固。最初，分封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汉初的安定局面与经济恢复，都颇得力于诸侯国。但随着诸侯王国逐渐强大，其与中央的离心力也随之加大，而一旦

诸侯王自以为能与中央抗衡，便有可能铤而走险抢班夺权，景帝朝爆发的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即为明证。如何才能彻底解除诸侯王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历史将这一难题交给了汉武帝。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身为武帝腹心之臣的主父偃上书提出：

材料呈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①其强而合从^②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③萌起，前日晷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⑤弱矣。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第9册），29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教师设问：

（1）在主父偃看来，当时汉朝廷面临的主要危机是什么？（参考答案：诸侯王国对中央政权构成很大威胁。）

（2）针对这一危机，主父偃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参考答案：实行“推恩”，即允许诸侯王把土地分封给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子弟。）

教师设问：主父偃的建议一经提出便立即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这是为什么呢？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早在武帝即位之时，诸侯王国已经发展到24个。武帝心中清楚，要确保中央政权对诸侯王国的控制就必须削弱它们，关键是采取什么办法才是上策？若强行“削藩”，则易引发诸侯叛乱；若采用主父偃的办法，则不仅能得到诸侯子弟的大力支持，朝廷还能以广施恩德之名，收分割诸侯王国力量之实。同时，由于侯国地位等同于县，且一旦封立，便从王国中分离出来，划归附近的郡管辖，更有利于中央政权的控制。因此，“推恩”之策堪称一举多得的上上之策。于是，当即下诏：

① 阻，依仗。

② 合众，联合起来。

③ 逆节，叛逆的念头或行为。

④ 适嗣，嫡长子。

⑤ 稍，渐渐地。

材料呈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①，朕且临定其号名。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一·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第3册)，
10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教师设问：依据材料，“推恩”与否的决定权掌握在谁之手？(参考答案：诸侯王。)

教师设问：“推恩”与否由诸侯王自行决定。诸侯王心中亦十分清楚，其子弟众多，若是全部分封，自身的地盘与实力无疑将大为削弱。那么，此时的诸侯王是否会响应武帝的“推恩令”？

材料呈现：各诸侯国王子侯表

城阳	赵国	中山	菑川	河间	济北	齐国	长沙	代国	广川	鲁国	胶东	梁国	衡山
33	24	20	17	11	11	11	11	9	8	5	3	1	1

——安作璋、刘德增：《汉武帝大传》，10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教师补充：自元朔二年“推恩令”颁布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20个诸侯王国中，除6国没有分封外，其余14个王国中，王子封侯者达165人。

教师设疑：从“推恩令”实施的结果看，“推恩令”得到了多数诸侯王的响应。为什么诸侯王明知执行“推恩令”便意味着削弱自身的实力，却仍然响应？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推恩令”之所以能得到多数诸侯的响应，固然有诸侯子弟积极支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诸侯王出于各种现实因素的考虑不得不出响应。

教师讲述：早在汉文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著名政论家贾谊就曾提出分封诸侯王子弟为王的策略。根据这一策略，汉文帝分齐国为七、分淮南为三，汉景帝分梁国为五。可见，在对待诸侯王国的问题上，“分而治之”是汉初几代皇帝削弱王国势力的一贯做法，汉武帝的“推恩令”不过是为这一做法披上一件温情脉脉的外衣而已。因此，诸侯心知肚明，若不响应“推恩令”，便意味着对抗中央政府。另外，据《史记》记载：

材料呈现：今上即位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②廩庾^③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④朽而不可校。太仓

① 条上，列出上报。

② 都鄙，城市和乡村，泛指全国各地。

③ 廩庾(lǐn yǔ)，米仓和谷仓，泛指粮仓。

④ 贯，穿钱的绳索。

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第4册），

14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教师讲述：尽管有学者考证，武帝即位之初的经济状况并不像《史记》所描述的那么繁荣，但的确堪称空前繁荣，因此武帝完全可以凭借几十年来积累的物质财产，对敢于叫板中央的诸侯王国实施军事打击。况且还有“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的前车之鉴。刘濞曾叫嚣：

材料呈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28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教师讲述：然而，仅仅三个月，来势汹汹的叛乱便被镇压了下去。实践证明，诸侯王国要对抗中央政权，绝非易事。

教师补充：而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明，那些心怀野心，为保存自身实力而没有执行“推恩令”的王国大多不得善终，例如淮南王刘安因谋反被诛杀，淮南国变为九江郡；江都王刘建想借刘安谋反浑水摸鱼，抢夺帝位，阴谋败露后被迫自杀，江都国变为广陵郡。

教师设疑：令人费解的是，汉武帝一面颁布“推恩令”，利诱各王国推恩子弟，裂土封侯，以削弱诸侯王国；另一方面，却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分别封皇子刘闳（hóng）、刘旦、刘胥为齐王、燕王、广陵王，天汉四年（公元前97）封皇子刘髡（bó）为昌邑王，而四位皇子终武帝一朝，均不曾实行“推恩令”。这是为什么？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刘闳的国都临淄，是当时东方的大都会；刘旦的国都蓟，位于今天的北京，是当时北方的大都会；刘胥的国都广陵，位于今天的扬州，是当时东南方的大都会。三国呈犄角之势，分别控制着东方、北方和东南方。刘髡的封地在昌邑，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有利于加强中原一带的力量。由此可见，汉武帝分封皇子的目的在于拱卫中央。而四位皇子之所以不曾执行“推恩令”，则是汉武帝有意保存其实力，以震慑其他诸侯王。

教师引导学生小结：综上所述，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并非是对分封制的全盘否定，而是旨在通过改革分封制，将诸侯王国纳入中央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使之能够适

应中央集权的需要，适应“大一统”的需要。而诸侯王国是否需要执行“推恩令”，关键亦取决于其是否有利于巩固中央政权，是否有利于巩固“大一统”的格局。

设计点评

本微课以汉武帝颁行“推恩令”为视角，通过层层设置悬念，引领学生剖析汉武帝颁行“推恩令”的前因后果，从中感悟“推恩令”所包含的政治智慧，进而认识“推恩令”对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汉朝“大一统”的积极意义。

微课设计二：从汉武帝裁抑相权看汉“大一统”

设计意图

裁抑相权是汉武帝强化皇权、实现“大一统”的重要举措之一。本微课拟以汉武帝裁抑相权为视角，通过展示汉武帝裁抑相权的种种复杂举措，引导学生理解与认识汉朝的“大一统”。

设计方案

教师讲述：汉初，崇尚拜功臣为相。萧何、曹参、陈平等开国元勋，凭借其为刘氏政权的创建立下的汗马功劳，先后担任丞相一职。

材料呈现：相国^①、丞相……掌丞^②天子助理万机。

——（东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第3册），

7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教师设问：丞相的职责是什么？（参考答案：帮助皇帝处理政务。）

教师补充：“丞”与“相”，原义皆为“副”，因此，所谓“丞相”，就是皇帝的“副官”。他们帮助皇帝处理政务，权力自然很大。

① 相国，其职权与丞相并无差别，但地位较之丞相更为尊贵。

② 丞，辅助。

材料呈现：皇帝在道，丞相迎见，皇帝要下车还礼后再上车走。谒者（掌宾赞受事礼官）要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皇帝如见丞起，也要起立而后坐。谒者要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①

——杨生民：《汉武帝传》，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教师设问：丞相的地位怎样？（参考答案：地位十分尊贵。）

教师补充：汉初尽管丞相位尊权重，但由于此时朝中尚有一批功臣，丞相在朝中并无绝对优势，因而尚未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至景帝时期，一方面，开国元勋老死殆尽；另一方面，丞相位尊权重的传统得以保留，遂导致皇权面临被削弱的危险。但由于当时来自诸侯王的威胁更重，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诸侯王，景帝不能过于削弱相权。那么，如何才能改变丞相位尊权重的传统，解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

教师讲述：元朔五年（公元前124），76岁的公孙弘成为武帝朝第六位丞相。

材料呈现：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②，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第二十八》（第9册），

2620～26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教师设问：从材料看，武帝开创了什么“故事”？（参考答案：先拜相后封侯。）

教师设疑：武帝为什么要将拜列侯为相的传统，改作先拜相后封侯？从下面的这件事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在公孙弘任丞相的第三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公孙弘此时正抱病家中，却深感刘安、刘赐之所以谋反，也是自己作为丞相不称职的缘故，于是上表谢罪：

材料呈现：今臣弘罢驾^③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④臣弘卒伍^⑤之中，封为

① 原文出自《汉旧仪》：“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见（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第五十四》（第10册），3414～34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故事，先例。

③ 罢驾，低劣的马，喻人的才能低下。

④ 擢（zhuó），提拔。

⑤ 卒伍，指乡里。

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①不足以称^②，素有负薪^③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第9册)，
29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教师引导学生继续分析：因此，武帝之所以要将拜列侯为相的传统改作先拜相后封侯，大概是因为如此一来丞相容易产生“无功而封”的心理，从而更易于驾驭的缘故。终武帝一朝，言行谨慎的丞相，并非只有出身平民、无功而封的公孙弘一人。据《汉书》载：

材料呈现：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皆以列侯继踵，齷齪^④廉谨，为丞相备员^⑤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著于世者。

——(东汉)班固：《汉书卷四十二·申屠嘉传第十二》(第7册)，
21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教师设疑：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分别为武帝朝的第三位、第五位、第八位、第九位丞相。此四人均系功臣子孙，袭封爵而贵，以列侯身份继任丞相。且薛泽、庄青翟、赵周三位丞相在位之时，正值武帝朝多事之秋，以丞相之职高位显，本应有所作为，何以《汉书》只记录了他们的谨小慎微，认为他们不过是凑数的丞相，无任何建树？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武帝撇开以丞相为核心的“外朝”，依托左右亲信近臣，组成直接听命于皇帝指挥的“中朝”独断国事，是上述丞相缺少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汉武帝知人善任，且用人不拘一格。武帝一朝人才辈出，何以所选丞相却多平庸之辈？由此，便不得不引人猜想，此乃武帝有意而为之，其意图则在于借丞相的平庸减少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但武帝对相权的打压并未止于此。

教师讲述：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公孙贺成为武帝朝第十一位丞相。

材料呈现：初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

① 行能，德行、才能。

② 称，合适，配得上。

③ 负薪，古代士自称疾病的谦辞。

④ 齷齪，拘谨的样子，谨小慎微的样子。

⑤ 备员，凑足人员的数，充数。

为官，材诚不任丞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①矣。”

——（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六·公孙贺传第三十六》（第9册），
2877～28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教师设问：公孙贺的夫人是当时卫皇后的姐姐，公孙贺本人曾因军功封侯，后因犯法而失侯。此番拜相，公孙贺不仅得以位极人臣，且得以再度封侯，本应喜极而泣才是，何以其却悲哀涕泣，竭力推辞？（参考答案：公孙贺认为武帝“贤明”，自己才能不足以担负丞相职责，将使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教师补充：公孙贺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在公孙贺之前，已有三位丞相死于任上：先是李蔡，因犯下盗用景帝园隙地的罪行而自杀；接着是庄青翟因卷入陷害酷吏张汤一案，下狱自杀；然后是赵周，因未能纠正、揭发列侯助祭的“酎金”成色不足，下狱自杀。如前所述，庄青翟与赵周皆是谨小慎微之人，结果竟也未能幸免，足见此时武帝处置丞相之严酷。历史的发展最终应验了公孙贺的担心。征和二年（公元前91），公孙贺受儿媳阳石公主与儿子公孙敬声诅咒武帝一案牵连，下狱自杀，全家族灭。

教师设疑：武帝在位54年，先后任用13位丞相，其中有6位因犯罪被杀或自杀。西汉共有8位丞相被杀，武帝朝就占了6位。武帝对相权打击力度之大，在西汉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那么，在武帝打出的这一系列针对相权的组合重拳的背后，除了考虑丞相位尊权重势必威胁皇权之外，是否还包含着其他因素？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武帝即位之时，不仅继承了父祖留下的巨额物质财富，也继承了父祖留下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侯王骄横不法，甚至有的觊觎皇权；丞相权势过大，皇权被削弱；大漠匈奴不时侵扰；等等。武帝十分清楚时代赋予他的重大使命，他曾说：

材料呈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第2册），7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① 殆，危险。

教师讲述：武帝在其执政期间果断而积极地变更制度，消除边患，以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对此，司马迁将武帝一生的文治武功概括为八个字：“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然而，手握大权，负责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丞相对武帝的种种作为却未必能够理解，由此必然导致皇权与相权之间产生诸多分歧与摩擦。因此，武帝要贯彻自己的意图，实现自己的抱负，打压相权便势在必行了。

教师引导学生小结：武帝裁抑相权，一方面固然是要铲除相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只有强化皇权，方能为其一展雄才大略，实现“大一统”扫清障碍。



设计点评

本微课以汉武帝裁抑相权为视角，通过展示武帝裁抑相权的种种复杂举措，通过层层设置悬念，引领学生深入思考，不仅有助于学生充分理解武帝裁抑相权的真实意图，亦有助于学生从中认识武帝加强皇权以实现“大一统”之苦心孤诣。

教学资源

资源1：纵观人类各国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希望在分裂和战乱中生存。但至今为止地球上仍有许多国家仍处于分裂与战乱中。大一统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自古以来期许“大一统”国家与中国人所处东亚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地理位置有关。中国人最早兴起的地方是几大生态区域的交汇地带。因此中国之名就来源于“中”。从已知的考古和历史资源来看，中国最早的人类北京山顶洞人、陕西蓝田人、云南元谋人、辽宁红山人、内蒙古河套人都生活在长城沿线和藏彝走廊沿线，以后兴起的仰韶、龙山、马家窑、三星堆、金沙、鄯善洋海、苏贝希、楼兰、定日^①等地的文明也均分布在长城、藏彝走廊和丝绸之路沿线。由于长城、藏彝走廊和丝绸之路地带的生态

^① 参见徐黎丽、杨朝晖：《民族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载《思想战线》，2012（3）。

环境易于古代中国人汲取两种或以上生态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来维持生计，且多种生态环境的连接地带易于交流与合作，而这些地带又恰好处于中国海拔、纬度、气候的第二台阶上，即温度、湿度宜于人类生存，山不太高，又有充足的水源。因此居于这些过渡地带的中国人自然就中自居，并在技术和能力提升的情况下向四面发展。最终使中国成为由四大生态文化区域构成的国家。这四大生态文化区域分别是：灌溉农业区域，包括珠江、长江、淮河、黄河、辽河、松花江、黑龙江等平原区域；高纬度低海拔游牧区域，包括蒙古高原及阿尔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地区；低纬度高海拔畜牧区域，主要指青藏高原；绿洲农牧兼营区域，包括宁夏、甘肃、新疆戈壁沙漠地区。^①可以说中国人从源头上来说为同种，但随着起源地带人口越来越多且这些地带作为多种生态交汇地带的地质条件易引发诸如地震等自然灾害，因此中国人就逐渐向东南西北迁徙，形成历史上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居住格局。这种分类，只是因迁徙到不同生态区域的中国人适应自然环境而创造出的从生计到信仰的文化特征而为。但处于不同生态区域的中国人却并不能真正互相分开，一是因为有共同的起源地；二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通过起源地带建立的从生计到信仰的互补生活使他们无法分开；三是因为他们经历分裂与统一的反复实践后，从皇帝到平民都意识到“大一统”天下观对中国人的生存的重要性。鉴于以上中国人的生活实践，最终中国人选择“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并通过不断完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来维护。这便是中国人“大一统”天下观能够深入人心的客观原因。

——徐黎丽、李姝睿：《“大一统”天下观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影响》，

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资源2：汉武帝更为关心的是，如何从制度上侵夺相权，于是有了“中朝”和“外朝”的划分。所谓“外朝”是指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中枢，它在“中朝”出现之前，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唯一的官僚系统。“内朝”则是汉武帝新创设的机构，从本质上说来，它只是由皇帝所信任的人组成的亲随和秘书班子。汉武帝把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之臣，作为形成阶段“中朝”官员的主体，利用他们擅长言辩的特点，让他们与丞相为首的大臣就某些决策方案展开辩论，结果是“大臣数绌”。实际上这是汉武帝巧妙地引导“外朝”官员

^① 参见马大正：《关于构想中国边疆学的断想》，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

淡出决策权、退居执行者。因此，颜师古对“中朝”“外朝”的界定是：“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①所论虽未臻完善，但就揭示其本质而言，无疑是准确的。

“中朝”制度在汉武帝之后发展得更为完备，本文对此无意多作深究。至于“中朝”的形成原因，倒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汉武帝创设“中朝”，不是出于削弱相权的考虑，而是因为当时的“行政中枢客观上软弱无力，不能胜任武帝时代大肆更张的需要”。^②……如此推论是值得慎重思量的。因为行政中枢的软弱无力是由丞相不得其人决定的，而选择和任命丞相的权力恰恰掌握在汉武帝手中。当时有人才济济之誉，汉武帝不任命具有行政能力的大臣为丞相，而是选择李蔡、公孙贺之类的武夫，以及严青翟、石庆、田千秋这样的质朴长者出任，其真实用意就是让丞相徒有虚名，不能理政，这样才便于汉武帝通过“中朝”而把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行政中枢的软弱无力，不是汉武帝无奈面对的前提条件，而是他有意造成的客观事实。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是：汉武帝明明知道石庆任相不免尸位素餐之讥，但是当石庆借阴阳失衡而自动引咎辞职时，他却勃然大怒，严加斥责，迫使石庆照旧任职。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丞相居位而不亲政事，正符合皇帝的需要和愿望。所以，“中朝”体系的出现，应该从皇帝的集权意识方面去寻求。汉武帝控制下的丞相，只能从属于皇权，而不允许稍有制衡的可能。此举使得国家正常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能受到破坏，而皇帝专制的因素得到强化，从长远来看它的负面作用是不应该低估的。从立制的即时效果而言，汉武帝设立“中朝”与清雍正时创建军机处颇有类似之处，可以收决策快、速、密之益，这是支撑他的“更化”事业所必须的。

——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资源3：造就汉武帝文治武功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武帝的才识。“雄才大略”，是班固写完《汉书·武帝纪》后给武帝下的一个概括性的评语。“雄才大略”是说武帝才气横溢，眼光远大。他不是在一桩事的处理上，一个人的使用上一贯正

①（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第三十四上》（第9册），27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原文为“行政中枢客观上软弱无力，不能胜任武帝时代大肆更张需要的结果”，见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17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确，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有可能处置不当。但是，他有通览全局之才能，他的才华体现在对天下大势高屋建瓴般的明察和把握上。即位之后，他凭藉父祖积累的财富，“外事四夷，内兴功利”^①，此乃大势所趋，不得不为。武帝清醒地明白时代赋予他的使命，上面引用汉武帝的那一段话^②，在当时不是人人明白的。皇太子刘据没有意识到，故武帝让卫青把这番话转告他。大臣汲黯也没有意识到，张汤更定律令，汲黯责问张汤：“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并警告他：“公以此无种矣！”^③武帝征伐匈奴，汲黯也竭力反对，主张“与胡和亲，毋起兵”^④大臣韩安国同样没有意识到，在讨论对匈奴和战问题时，他竭力主张和亲，反对战争。实际上，不独刘据、汲黯和韩安国三人如此，大多数人亦然。如韩安国力主和亲时，“群臣议多附安国”^⑤，即是例证。

当大功臻成，国内危机严重，百姓揭竿而起之时，武帝又清醒地意识到该是再次改弦更张的时候了，他毅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轮台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⑥也就是说，把军国大政的重点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转移到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上来。实际上，这一转变是武帝的既定方针。不过，他原本把政策的转变设计在下一代，由他的后任来完成。然而，时局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提前。对于这种转变之必要，当朝公卿如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搜粟都尉桑弘羊等并没有意识到，桑弘羊甚至至死未能理解。武帝慧眼独具，从种种迹象中发现已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正是这一转变，挽狂澜于既倒，并使大汉皇朝再次焕发生机。在武帝死后，又出现了“昭宣中兴”。

——安作璋、刘德增：《论汉武帝》，

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①（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第4册），11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汉武帝的那一段话为：“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北伐，天下不安。”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第2册），7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③（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汲黯传第二十》（第8册），23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④（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汲黯传第二十》（第8册），2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⑤（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二十二》（第8册），23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⑥（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第12册），39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资源4:“尊儒”与“尚法”相结合，骨子里将君王取下的权术和严施刑罚这些法家的办法作为根本的手段，用儒术加以缘饰，正是武帝政治的特点。汲黯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①，讲的也是这个特点。公孙弘在其对策中，既标榜儒家的仁、义、礼，又特别强调法家的权术，说：“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②如此重视和阐释君王取下之术，正投合内心“尚法”的汉武帝之所好，所以汉武帝擢升公孙弘为第一名。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③故连续升迁，至拜相封侯。以“儒术”来缘饰律令法术，是汉武帝和公孙弘所共同的特点，武帝时期官场那种“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④的习气，正是“尚法尊儒”政策造成的。

——白寿彝总主编，白寿彝、高敏、安作璋本卷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2版，2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资源5:于公元前221年建国的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汉承秦制，将大一统的专制形式延续了下来。秦汉的政治形式相对于西周而言，其本质特征在于权力的集中和皇权的强化。所谓政治大一统，意味着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上主张中央集权，抑制强大的地方势力。我们知道西周对权力关系的界定在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⑤或“扞御侮者莫如亲亲”^⑥也就是强调天子对诸侯的血缘联合或拱卫关系，不会也不必要对地方权力有意识地控制和打压。与之相对，秦汉大一统王朝所追求则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式的中央对地方的完全控制。秦王朝废诸侯国为郡县，郡县没有独立的财政赋税支配权和郡守的人事任免权，更没有军队调动和使用权。连可能威胁到中央权力的巨贾富户都要迁徙到首都周围加以监视，不能不说较之前的任何朝代，秦朝对中央集权的推行都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①（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汲黯传第二十》（第8册），23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第二十八》（第9册），26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第二十八》（第9册），26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④（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第10册），31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⑤ 张燕婴译注：《论语·季氏第十六》，2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⑥ 李梦生：《左传译注卷六·僖公中（僖公二十四年）》（上），27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在一个幅员广阔的专制帝国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即政治大一统的统治形式，其整合难度可想而知。秦朝立法家为统治思想，施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出现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都表明法家已经看到了政治大一统需要思想大一统，也就是需要由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理论整合多元化的思想文化。但法家以极端现实主义和“有见于国，无见于人”^①的整合方式构筑的集权专制国家有悖传统和人性，秦朝二世而亡即宣告法家文化政策的失败。所以说虽然秦朝以集权专制的统治形式取代了封建宗法制，但它仅仅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创建，并未来得及将这种政制做一更精深的加工和改造，并没有设计出一种能够更好地契合这种政治制度的文化政策。由此，轴心裂变之后文化、价值创建的任务即交给了汉朝。

代秦而治的农民起义集团，在刘邦的带领下开始了汉代的统治。汉朝继承了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但面对秦政和战火洗礼之后百业凋敝的境况，汉初统治者在文化和政治策略上进行了两大改变，一是采取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大封同姓诸侯王，试图依靠刘姓宗亲巩固汉室江山。事实证明，黄老的统治思想的确为社会经济的复苏贡献了力量，但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制度（郡国制），却给后来的汉室带来扰攘百年的危机。在危机的克服中，汉朝统治者有意识地强化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并吸取秦亡的教训，排除了立法家为统治思想的可能，试图确立更为积极和人道的文化政策以巩固政治大一统，出于这种文化整合和价值重建的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登上了历史舞台，儒学开始了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化进程。

——张颐：《儒学与政权之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文化政策再思考》，载《研究生法学》，2012年第6期

资源6：所谓“大一统”本文重视法家李斯的说法，即“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②。如上文所述，政治大一统是从秦始皇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开始的。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秦王朝定法家为一尊，采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虽然法家反人道的政治、文化统治方式最终导致秦王朝的终结，但不可否认的是，秦王朝初建的时候具备了设立大一统的文化政策的社会条件即政治大一统，而这种社会条件在西汉中期汉武帝统治时期再次成熟。

①（清）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卷·原道下》，1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8册），25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西汉中期大一统文化政策的推行是直接承起于秦代的，这要略过汉初数十年的黄老无为的文化政策，因为它虽然是汉初的统治思想，但黄老之学本质上讲并不是能够与大一统政治相适应的积极的文化政策。“秦皇汉武”，同为中国史上之雄主。秦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禁天下之以古非今。迨于汉武，不及百年，乃表彰六艺，高慕尧舜，处处以希古法先为务。若汉武之于始皇，所处在绝相反之两极。^①虽然一个反古，一个稽古，但是两者殊途同归，因为都是“务于治”的政策而已，统治者不见得真正推崇和信服。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杂霸统治，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独尊儒术”政策的联络下，儒学与政权是一种合作关系。然而越是不信仰，越能够体现儒学自身的整合和论证专制集权统治的功能。这说明统治者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审视儒学的，儒学对政治大一统的巩固和强化作用可见。

汉代儒学之所以能够满足统治者对大一统文化政策的要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汉代儒学由孔孟的“迂远而阔于事情”^②转向了经世致用的探索，更注重对时代思潮的兼容和与政治社会生活的结合。秦汉时代的社会思潮在于“外在的宇宙仍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式的概念所表述……并渗透到各个领域，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一解释系统，于是就用它作为理解和处理天地人神一切问题的内在理路，由此衍生出种种知识与技术。”^③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正是将这种思潮融入理论系统的建造中，并结合黄老、法、墨、阴阳等各派的理论，最终形成了天人合一政治论，为“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做好了理论准备。天人政治论正是从天命论、宇宙观的角度巩固和强化了大一统的政治即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汉武帝如果要推行一种契合政治大一统的文化政策，那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当然的选择了。

很多学者认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同秦始皇禁绝诗书与焚书坑儒异曲同工，因此视董仲舒为文化刽子手。事实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是建议汉武帝不再设立其他学说的博士，不以其他学说作为统治思想、仅赋予儒学以统治思想的权力而已。终汉之世，百家学术并没有受到灭绝，而且无所不究，各有所成。若是认为“罢黜百家”是禁绝百家的思想和著述，认为

① 钱穆：《秦汉史》，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②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第7册)，2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334~33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董仲舒是思想史的千古罪人，那就是夸大这一文化政策的影响力了。

——张颐：《儒学与政权之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再思考》，

载《研究生法学》，2012年第6期

资源7：秦统一中国，一统由理想变为现实。汉承秦制，实际上是秦一统制度的延续与发展。秦汉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经夏、商、周的发展而最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边疆民族成分，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人数更加众多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它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及凝聚的核心。秦汉的统一与边疆开发，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创造了各民族共为一体的“华夷一统”的现实，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方面的进一步统一，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四夷”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思想上的统一，而公羊学说以其“大一统”理论尤受重视。“大一统”的理想境界是“王者无外”^①，但理想的实现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公羊学倡“三世说”，以“大一统”为宗旨，将这一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②；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③《公羊传》将《春秋》所载鲁史分成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三个阶段来加以比附，以所传闻世为据乱世，以所闻世为升平世，以所见世为太平世。其太平世“王者无外”，与大同说合，是理想的“大一统”。公羊学说产生于战国末年而盛于西汉，实际上里面包含着汉儒对“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董仲舒是汉前期著名的公羊学大师，他把战国以后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使儒学成为“霸王道杂之”^④、合于汉家制度的学说；进一步阐发了公羊学说的“大一统思想”，建立了一整套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发展需要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

秦汉空前统一政治格局为人们提供了对“大一统”理论进行思考、总结和提高的现实基

① 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隐公元年》（全二册），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② 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成公十五年》（全二册），41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③（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卷第一》（全二册），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④（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第1册），2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础,从而使“大一统”思想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完善,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并最终确立下来。

——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资源8:秦汉时代“大一统”精神的弘扬与践行,其次反映为制度文化上的统一。秦代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地方行政机制乃至统一一般的社会风尚习俗等举措:“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①;“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②因此,司马迁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还是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③在两汉时期,也是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赋税徭役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选官任官制度、学校教育制度,这方面的努力,自刘邦创建西汉王朝时即已开始:“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④。经过数十年的整合、发展,这种制度文化上的统一,到汉武帝时期基本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形态,即如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⑤。两汉以降,这种制度文化上的统一,始终为当道者所汲汲追求的根本目标。

——黄朴民:《“大一统”原则规范下的秦汉政治与文化》,

载《学海》,2008年第5期

①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1册),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1册),2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③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8册),2546~25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10册),3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⑤ (南朝·宋)范曄等:《后汉书志第七·祭祀志上》(第11册),3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